

“认识你自己”：试论“以史为鉴”的另一层含义

谢川岭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以史为鉴通常被理解为借鉴历史，学习历史。但是鉴的本意是镜子，所以以史为鉴，也即把历史看成一面镜子，并透过历史的镜子，来照见人类自我，认识自我。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为了消除自身的异质性与陌生感，产生了认识历史的必要。这种认识根植于当下的立场，为当下而服务。所获得的认识结果也根据当下而不断变换，所谓假亦真来真亦假。历史认识终究也只是历史学家个人对历史的一种认知，历史学家表现自身精神价值的同时也表现了整个时代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历史 认识 当代 个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以史为鉴，其“鉴”在《说文》中的解释是“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在《广雅》中的解释是：“鉴谓之镜。”所以鉴的本意是镜子，含有警戒教训的意思。所谓以史为鉴，也即把历史看成一面镜子。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种，乃是“知兴替、明得失”，通过借鉴历史，来学习处理具体为题的方法，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为人处世，正如司马迁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二种含义，也即以史为镜，透过历史的镜子，来照见人类自我，认识自我，这应该算是“以史为鉴”的原意，也是以史为鉴的另一层含义。历史的作用，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认识你自己。”在当今社会，以史为鉴还普遍扮演着借鉴的角色，但笔者认为真正得以凸显的乃是其第二种，也即把历史当成一面观察人类自身的镜子，通过历史来理解和认识当下的存在，在认清过去的同时，赋予现实以合理性，平服人类躁动不安地的心灵。

一、认识历史的缘起

人类生活于地球上，相对于浩渺无垠的宇宙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与宇宙、人与物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割裂，这种主体与客体、内与外的分裂同样也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的对立相差异上。而人类因为由于理智，意识到了这种割裂和差异，产生了自我与他者的观念，打破了原来与宇宙浑然一体的状态，这种浑然一体的状态，在古代叫做“天人合一”。理智使得使得人类自身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成为宇宙中的一个异类，对人类来说，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是未知的，而这种未知高悬于心灵之上，就会在心灵中产生巨大的紧张、压力、恐惧。这种紧张和压力像梦魇一样一直缠绕着人类，人类为了消除这种紧张和压力，不得不向外探索宇宙，向内探索自身。我认为这就是埋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下的“原型”，所谓“宗教”“科学”都由此诞生。但是在向内探索自身的时候，人类必然会对现在的我产生疑问，会问“我是谁”，但是人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我是怎么来的”，而这，就必然要对人类的产生进行纵向的梳理，而这纵向的梳理，便是梳理“人类的过去”。而对人类过去的追溯，其源头可能是“神”，也可能是“自然”。如果人

类把源头看成是神，那么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认识就会保存在各种原初的神话传说之中，如果把源头看成是自然，那么就极有可能产生对过往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文献记录。

这里还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也即“过去”和“历史”，首先，如果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重合，这就意味着人类从产生意识的那个时期开始，就已近有了历史意识，也就是对过去进行追溯的意识，不管追溯的源头是“神”还是“自然”，人类总有那种通过认识过去来认识自我的本能，而这种本能来自于人类想要消解人与宇宙之间差异所带来的紧张心理。在此定义下，我们可以说，最初的那些神话传说就是人类最早的历史。其次，如果我们把“过去”定义为人类意识所能把握的一般时间观念，而把“历史”定义为人类意识带有理性地去认识过去的时间观念。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先有“过去”的观念，后有“历史”的观念。因为对于最初的人类来说，一般的时间观念从意识存在的那一刻便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但是这种“过去”意识，未必是理性的，人类很可能将自己的过去归结于神，所以无论东西方，都出现了有关自身的神话传说。而“历史”观念的产生，就在于人类用理性的剔刀剔除了“过去”观念中所存在的非理性色彩。这种“历史”的观念的产生需要等到轴心时代，东西方理性意识普遍发生之后才能出现。因而，“历史”的观念后于“过去”的观念，当然也可以说，“过去”与“历史”同样是对时间的一种纵向描述，过去之中包含着历史，而历史不同于过去的地方在于它有理性。这样看来，神话传说由于它的非理性，不能等同于原初的历史，但是它其中已经包含着历史的影子了，毕竟神话传说里也包含着有关人类的纵向描述。

总之，自从人类的意识出现以后，人类就在对自己进行时间性的纵向梳理，不管这是“过去”，还是“历史”，“历史”观念的产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就如理性的产生不可避免一样。布克哈特曾说过：“历史是由意识的觉醒而引起的与自然的分裂。”^[1]这句话说得颇为客观。

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识历史的立场

人对历史的关注和认识是根植于人本身的，是为了消除现实心灵中的压力、紧张和痛苦的，是为了给自我的存在赋予一种合理性的，不存在所谓为历史而历史的可能。这个人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抽象的人，而是一代代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每一代人回顾历史、研究历史都是根植于每一代人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包含着当时各种矛盾、冲突、问题，也包括意识、理想、信念。如何为这这些矛盾、冲突、问题找到一个源头，如何支撑和内化这些深层次的意识、理想、信念，这就是历史学家思考出发点，也是目的地。而社会和时代变化所带给人类的陌生感，使得人类陷入一种惶恐、焦虑和紧张的境地，引发对存在意义本身的怀疑，为了消解这种怀疑，那么就需要为整个社会、民族、时代的善恶、好坏赋予合理性，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家也不是虚幻的个人，他生活于社会中，是社会的代表，能深深感受到社会状况和时代情境变化，那些优秀的历史学家通常像诗人一样能够感受到现实的痛苦和快乐。这种对现实的感受促使着历史学家去梳理过去的历史，重新建构一个历史世界，从而通过历史来把握现在，为紧张而割裂的社会与个人赋予合理性，抚慰人

^[1] 转引自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21页。

类躁动难安的心灵。所以，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探究和认识不可能抽调现实的基础，这就如丸之走盘，现实就是这个圆盘，历史就是盘中的弹丸。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也认为历史：“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2]总之，人们以现代的问题意识去回溯过去，所以历史之镜中照见的也是我们现实的人类。历史学虽然是在认识过去，但终究还是要立足当下、回归当下。那么这种基于现实的认识历史的结果，究竟是“真”是“假”？

三、“假亦真来真亦假”：历史认识的结果

自然科学是人类向外界探索的工具和手段，在近代以来为人类创造了非凡的物质财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既不断瓦解着宗教，同时也在理念上深刻地影响着人文学科。最能影响人文学科的理念就是“求真”。求真几乎成了所有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和金科玉律。历史学也同样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文学科是为当下人服务的，它要为当下人的心灵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为当下人的存在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所以它受制于当下的矛盾冲突、理想信念，它必须把自身的面貌改造成当下的面貌，以当下人的存在为转移，时代不同、情境不同，它所作的解释和证明就会不同，它所追求的“真理”也同样不同。和自然科学的不变的“真”不同，人文科学的“真”是变动的，但“真理”是要求唯一的、不变的、稳定的，所以，与其说人文科学是“求真”的，毋宁说它是“求假”的。可以说人文学科不以求真为目的，却是以求假为目的。或者说，自然科学为了人类外在身体的存在必须求真，人文学科为了人类心灵的存在必须求假。可是这种“假”却又必须“真”的，因为只有是“真”的，人们才能相信它，人们的心灵才能得到安慰。与当下符合的话，人们乐于相信，那么假的便是真的，与当下不符的话，再真也是假的，因为没人会相信。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既有人文学科的共性，也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它既不像文学那样信马由缰、随意虚构，也不像哲学那般根据宏大框架进行选择性的填充，因为它受制于过去最基本的事实。历史是一种人类集体的记忆，它与个人的记忆有着可比性。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记忆，记忆以及对记忆的评价塑造了个体的人，这种记忆里保存的就是个体从小到大的历史。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个人记忆的放大，它塑造的是整个人类。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差别在于，个人记忆是短暂的，因为人生命是短暂的，而集体记忆是“长存的”，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长存的。每一个人从出生起，就要重新学习人类所传承的知识，获得自己的记忆，而随着个体的死亡，所有的记忆都会凋亡，集体记忆则可以世代积累，不断的增多。集体记忆之所以能不断的传承，本身也是以个体记忆的遗忘为代价的，如果个体记忆能一直保存，那么集体记忆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这种集体记忆虽然相比于个体记忆来说是“长存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是永恒的。个人的记忆会伴随着个人生命的终结而消亡，集体记忆同样会因为集体的终结而消亡。比如说，因为各种原因，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等，都会导致许多古代民族灭亡，许多文明消失。而这其中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各个文明和民族的

[2]转引自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5页。

集体记忆。也许其他文明中还保存着有关它们的些许记载，也许通过考古发掘能让它们重焕荣光，可是终究也只是找出了其中的残篇断简和蛛丝马迹而已。集体的记忆在集体破灭的那一刻，便也逝去了。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过一种文明形态史学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消亡四个阶段。当然，汤因比所说文明形态，是在整个人类群体内的小群体，各个小群体都会经历生长解体的过程。那么要如何来看待整体人类文明呢？整体人类文明相对于内部的各个文明形态来说，它是长存的。人类文明的长存是以内部各个文明形态的消失为代价的，这就如同集体记忆的长存以个人记忆的消亡为代价。由此，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人类文明这个集体是否就是永恒存在的，而整个宇宙星空中是否还存在着同样的智慧文明。很明显，人类文明作为一个集体，未必就是永恒的，其实只要一次核大战，一次外来的星球碰撞，人类就会像恐龙一样消失。至于宇宙星空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文明，现在无法回答，不过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存在，那么这也意味着，人类文明以后需要和其他智慧文明竞争，人类文明同样也有一个类似汤因比所说的生长、鼎盛、衰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明是可能凋亡的。所以人类集体也不一定是永恒的，人类的集体记忆也不一定是永恒的，人类的集体记忆只是相对于个人记忆而言长久一点而已。当跳出人类的视角，会发现整个人类的集体记忆也是短暂的。所以，就时间的长短而言，集体记忆虽然与个人记忆有着差异，但是根本上是存在一致性的。

其实，人类对待集体记忆也就是历史的方式和个人对待记忆的方式是相似的。比如，一个人的记忆是无法保存他所有经历过的人和事的，他所记住的必然是对他人生有重要影响的那些部分。与此相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它所保留的历史，也是对整个民族、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再如，而在个人所记住的回忆里事情，也未必就真能符合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情况。因为由于时间的流逝，记忆能力的衰退，当下情感的境遇，个人对记忆的评价是变化的，对记忆的事实本身也是有所取舍的，到了极端的地步，更会对记忆进行错乱和删改。历史不也如此吗？时间的久远，资料的衰亡，民族情感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评价、取舍。对于个人来说，个人总是通过以前的记忆来理解现下的自己，为了符合当下的悲欢苦乐，凡是需要的回忆，就把它拾起，凡是让个人感到痛苦的、累赘的回忆，就把它或是埋在记忆的最深处，或是减省、或是进行删改。历史学家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根据着时代和民族的立场对历史进行着加减法则的运算，凸显什么历史、弱化什么历史，都有着深层次的现实原因。

按心理学的归因理论，人都会自觉地对自己的过去行为、事件的结果进行归因，人们在归因的过程中解释过去，并确定未来的方向，积极归因总能使人勇敢地面向未来，而错误的归因却会使人丧失面向未来的自信，这种归因实际上是人在从过去的自己为现下的自己寻找合理性与确定性，获得心灵的平静。对个人而言，大到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小到某件事情的成败，作某一次决定，个人都是从记忆中找到解释、找信念，找理由。对民族、人类而言，

民族特性，民族习惯，人性之常，人类命运，同样要从历史中找到解释、理由及信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归因。尽管个人从回忆中得来的解释、理由、信念未必就是回忆内容里的真实情况，但是只要这些回忆能够应付当下，不就已经足够了吗？至于真实的记忆，不过是一种相对而已，从客观上讲，真实的记忆是不可能的，从主观上将，我们也不需要真，除非它符合当下的需要。就如电影罗生门，同一个事件，每一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的回忆。然而，需要指明的是，记忆的改变和说谎不同，说谎是一种有意识的篡改，它甚至改变了基本的事实，这种蹩脚的篡改实际上并没有说服力，终究给予不了人坚定地信念。而记忆的改变实际上是人潜意识的改变，它更多涉及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评价，它让人相信这就是真实的记忆，从而给人以坚定的信念。

我们研究历史也是如此，只是为了理解当下生存环境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中找出一条合理的思路来解释当下存在的困境。随着时代不同，问题不同，对问题的阐释也必然不同。当下永远也找不到历史的真实面目，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只需要一个想象的真实面目来解释当下，来为当下赋予合理性。这实际上也就是在理顺一条巨大的因果链，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过去和现实。我们对历史所进行的想象，其实就如同我们在回忆自己的过去一样，实际上是一种重构，但这种重构绝不等于背叛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背叛了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与文学的虚构并没有什么区别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缺陷也就在这里。虚构的历史必然是粗糙的，也无法给人以信服，反倒会使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产生混乱，即便它能符合现代的观念，也注定被人们所抛弃，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假”的历史，与说谎并没有什么不同。那种过于官方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学通常有着这种毛病。

何兆武说到：“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 and 认定，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3]历史重构是以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所以历史学家认为他所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为了重构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会去小心考证推理每一件历史事实，这种工作做得越细致，越详实、越细腻，那么依靠历史事实所重构历史也就显得越真，它越能让人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对历史学家自己和读者才越有说服力。但是，要指出的是，历史学家在考据推理的时候，在重建历史场景的时候，更不用说在是非判断的时候，历史学家始终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偏向的标准，而这本就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价值、愿望、理念的体现。越能贴近民族、社会、时代的价值和理念，重构的历史则越真。这也就是历史学的第二个层次。

可是，这里又导致了分裂，就基本的历史材料而言，我们必须去寻真，但对于以因果逻辑重建的历史场景而言，我们必须越符合时代。或者说，真实的历史材料，使得我们对历史感到安心，现代的价值理念，使得历史能为我们所用。实际上，这并不矛盾，因为唯有这样，重构的历史才越显得真，才越具有合理性，才能越证明当下，符合当下，当下的人也才能

[3]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刘北城、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感到心灵的安慰、平静，并怀着了然的自信通向未来，勇敢地去理想的事情。其实当我们认为真掌握了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就给了我们做事情的底气和理由，就像心理医生对病人的精神进行合理的分析，为他的过去的记忆，不论是痛苦的记忆还是高兴的记忆，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让病人从精神紧张和崩溃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历史学家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也是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寻求历史之“真”的原因。

总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绝不是为了过去而过去，必然是为了现在而过去。然而，当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历史越符合当下，越符合的时代的时候，其实与真实发生的历史相比，它越显得假，它已与真实发生的历史渐行渐远了，经过每代人层积累造的历史，经过现实层层透染过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吗？优秀历史学家所建构的历史，相对于过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它是假的，但是相对于时代而言，它又是真的。所以假亦真来真亦假。

四、认识历史的终极目的：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

葛兆光提到一个命题：“一切海外中国学本质都是外国学”。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化，表面上看是在理解中国，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去理解中国，而在于去理解自己的存在，解释自己的存在，赋予本民族文化以合理性。他们看似研究中国，实则是在解释自己。其实，当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时，首先产生的是好奇心，紧接着是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双方的对比，在对比中，双方看到了彼此的不同、分歧、矛盾。一种文明有的东西，另一种文明也许没有，一种文明认为是合理的习俗，另一种文明也许是不合理的，一种文明认可的价值观，另一种文明也许并不认可。这里又隐隐包含了一个问题，也即双方哪个才是正确的、先进的、合理的，哪个是错误的、落后的、不合理的？这样，由于彼此的对立和不同，会导致对方文明内在的紧张、压力及焦虑。双方都试图证明自己所生存环境与文明的正当性、合理性，消除文明对立所带来的紧张、压力焦虑的感觉。于是，就不得不对异质文明进行了解和阐释，为对方建立起一个前因后果的体系。理解和阐释对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更为深刻地理解和解释自己文明的特征，最终是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以此消解异质文明所带来的紧张、压力及焦虑感。故葛兆光说到，海外中国学“第一，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首先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愿望’，他把‘中国’作为‘他者’，是通过你这面镜子来认识他自己；第二，他始终会在他的背景下选择课题。之所以说‘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是因为他有他的背景、脉络、问题意识。”[4]

实际上，一切海外中国学本质都是外国学这个命题还揭示了另一个事实，也即研究者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人，研究者必然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而这个群体会在时间的作用下，逐渐形成自身的生活习惯、情感情绪、思维方式乃至文化。这种群体扩而大之，就是一个个民族和文明。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免会沾染其中的民族特性和文明特性。研究者固然能号称客观立场、自由研究，可是这并不能意味着他能超越本民族从小就赋予他的语言、思维。在现代社会，由于交往与交流的加深，民族和文明的差异有逐渐消泯的倾向，可是这也

[4] 葛兆光、盛韵：《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

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的消失。只要人类还需要生活在群体之中，那么群体的烙印就必然会打在群体内的每一个个体身上。研究者想要彻底超越自己的群体进行纯客观纯自由研究，其实就像一个人站在大地上，却说要揪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升到半空一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研究者所谓的客观立场和自由选择本就受群体性的引导。而“一切海外中国学本质都是外国学”的提出就是根植于这种群体性的思路。

总之，一切海外研究中国的学问，本质上都是外国学，它以外国人自己的民族立场、问题意识、阐释理路在理解中国，理解的目的不在于中国，而在外国。反观之，中国人研究外国的学问，本质不是在于外国，而在中国。那么联系之前论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海外中国学本质都是外国学”，是否还能进一步引申出“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涉及到了研究历史的“此时”，“一切海外中国学本质都是外国学”涉及到了研究历史的“此地”，那么“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是否就是涉及到了历史研究的“此身”。毕竟，历史学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之前已经有所论述，人类研究历史是为了消解人类在宇宙中的陌生、异质所带来的紧张、压力、焦虑的情绪。当人类自以为掌握了自己，理解了自己，人类才对自身处于宇宙而感到安心、放心。人类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但它又是由一个个现实而具体的人组成。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它所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需要表现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身上。人类去陌生化、异质化以及消解紧张、压力、焦虑的情绪的过程，也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集中体现在个人的心灵之上。对历史所进行的研究，表面看起来是为了人类，实则它是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整体的人类历史也只有被个体的人所掌握，人类的历史才有意义。一部优秀的反映人类历史的著作，也只有被一个个具体的读者所阅读理解，这部著作才有价值、有意义，否则，它只是一段文字，一本束之高阁的书籍。所以，整体的人类历史要内化成个体人所把握的历史，人类史也就变成了个人史，人类史体现在个人史之中，个人史包含了人类史。个体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历史认识的终极目的。

再从历史学家的个人研究上看，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最初动机，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始于对自身的好奇与不解，当他不断问为什么自己会是现在这个样字的时候，他必然要从自己的一生扩展到家庭、家族、民族的历史，以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非如此，不能去除奇异、不解、未知所带来的紧张、焦虑和恐惧。而他研究的起点，也就在于为此时此刻的自己赋予合理性、正当性，使心灵重获安宁。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无论是材料的拣择，是非判断，历史再现，还是叙述角度，写作方式，他的态度、立场、思想、理念都融入这种历史重构的过程之中。历史学家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是具有主体性的，而这就来自于他自己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觉解。故何兆武说：“对历史的理解是以历史学者对人生的理解为其基础的。或者说对人生的理解，乃是对历史理解的前提。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

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 [5]但是，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又不仅仅是个体的，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学家是社会中的个人，真正优秀历史学家的感觉都是敏锐的，总能像诗人一样捕捉到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时代所承受的痛苦。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情感丰富，悲天悯人，所不同的是文学家的情感是外放的，通过对情感的宣泄，表达对时代的不满和未来的期盼，但这种宣泄绝非是无理性节制的。历史学家的感情是则是内敛的，通过对历史进行理性的观察，从而把握社会的病症，现实的症结，但这种理性的观察也绝不是无情冷漠的。所以真正的历史学家总能在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观念的同时，又表达出时代和民族的思想、情感、观念。

然而，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是刻意去表现社会和时代的病症，甚至他根本都无意于去表现时代和社会的病症，他所想表达的只是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纯学术研究的所思所得以及情感情绪。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人有意识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人在无意之中又是达到人类历史性的、有普遍意义目的的工具。” [6]所以，他越能表现自己、表达自己，他对历史的把握反而越深刻，对现实的反映也越深刻。他所建构的历史也越具有独特性，价值性。无论古今中外，各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通常都是如此。相反地，那些宣称要表现整个时代和人类群体的精神，并摒弃自我、坚持客观的历史学研究者，大多只能把握历史的皮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抛弃了具体而真实自我，而去追逐一个抽象而虚幻的人类群体精神，这样反而被束缚住了，为了表现时代和人类精神这种执念成了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忘记了自己就是时代和社会中的一员，表现了反映了自己不就是表现了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吗？这里好似形成了一个悖论，那种根植于自我，为了自我而进行的历史研究，能够反映人类和时代，而那种宣称要表现时代和人类精神所进行的纯客观的历史研究，反而反映不了时代和人类。所以历史学家终究是“为己”之后才能“为人”，真正的“为己”了自然能“为人”，这也就是所谓越主观才能越客观。

当然，每个优秀历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成长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也不同，所以情感思想并不一样，这也导致看问题的思路及方式也并不一样，这也使得他们重构的历史是千人千面的。但是这绝不意味要在这其中去挑出一个绝对真实历史，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只是在关注其中一个片面，并深入这个片面。这就像一群人围着一座山进行观察，每个人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他们所看到的画面也必然不同，这就如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说的一样，不过他们终究也看到了这座山的一个面，只有把各个面合起来，才能看出这座山的全貌。总之，无论从历史学家与整体人类的关系，还是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动机和过程看，历史学家深深地关注着自己的本身的需要。正是通过历史研究中表现个人自我的情感、价值、需要，从而表现了群体社会的情感、

[5]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刘北城、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6] 转引自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1页

价值、需要。正是赋予了个人以合理性的同时赋予了整体人类以合理性。历史学家的最终关注点还是得回到自己，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所以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缘起于人类有了意识之后，使得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为了解人生而异质性陌生性，所以不得不认识自我，认识自我就不得不进行追本溯源，这样就产生了认识历史的必要，历史研究的作用也就在于认识自我，消解人类在宇宙的异质性。历史研究必然是根植于当下的立场，为了当下而服务，所以所获得结果也是根据当下而又不断的变换，所谓假亦真来真亦假。而历史研究终究还是历史学家个人的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自身精神价值的同时也表现了整个时代精神价值。因此，对历史的认知终究还要在于为此时、此地、此身赋予合理性，并最终消除个人在宇宙人生的异质和陌生感。而所谓以史为鉴，在历史之镜中照见的自我终究只是一个虚幻而模糊的自我，但我们却因为看见了自我的虚影而大感安宁，历史的作用和意义也就在这里。

参考文献

- [1] 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2] 刘北城、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3] 葛兆光、盛韵：《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

"Knowing Yourself": Discuss the other meaning of using history as a mirror.

Xie Chuanling

(The Yue 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 410000)

Abstract: Using history as a mirror is often understood as learning from history . However,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Jian is the mirror,so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that is to say, look at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through the mirror of history, to see the human self and know oneself.Afte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beings from nature,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ir heterogeneity and strangeness,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history.This understanding is rooted in the current position and serves the present.The cognitive results obtained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so-called false and true come true and false. Historical knowledge is only a historian's personal cognition of history. Historians express their spiritual values and also express the spiritual values of the entire era.

Keywords: History;Understanding;The present;Individual

作者简介(可选):谢川岭(1993—)，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

